

ZENG GUO FAN QUAN SHU.

曾国藩年谱



曾
国
藩
全
书

ZENG GUO FAN QUAN SHU



远方出版社

曾國藩年譜

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
但以箕裘承祖澤

咸豐四年正月



且將艱鉅付兒曹
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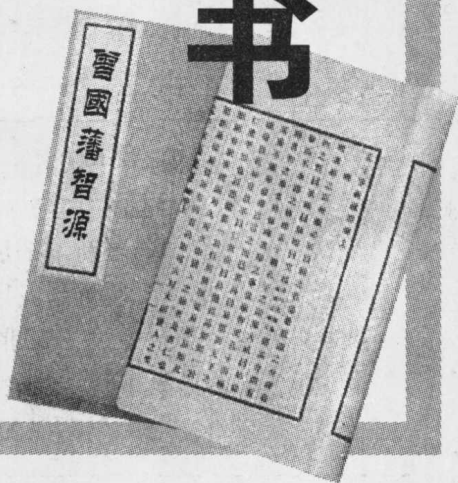
咸豐四年正月



曾国藩全书

主编 梁 勤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阿荣

曾国藩全书

主编：梁 勤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华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10.5 字数：5000千字

2002年7月第1版 200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套

ISBN 7-80595-769-X/K·27

定价：1980.00元



目 录

曾国藩还能热多久（代前言）	（ 1 ）
初识曾国藩（代总序）	（ 14 ）
卷一	（ 20 ）
卷二	（ 42 ）
卷三	（ 54 ）
卷四	（ 75 ）
卷五	（ 104 ）
卷六	（ 120 ）
卷七	（ 145 ）
卷八	（ 159 ）
卷九	（ 181 ）
卷十	（ 212 ）
卷十一	（ 227 ）
卷十二	（ 250 ）
曾国藩年表	（ 269 ）
卷一	（ 284 ）
卷二	（ 293 ）
卷三	（ 297 ）
卷四	（ 303 ）
卷五	（ 306 ）





曾国藩还能热多久（代前言）

新旧世纪交替，往往是旧有组织溃散和新组织创新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常常能造就一批有超常眼光审时度势的人，这些人的特殊凸现，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改变历史的进程。透过历史的烟雾，我们发现，在这样的时代，由于旧体制蜕变，社会控制减弱，社会空间相应增大，以至群雄蜂起，人力资源和各种社会资源容易得到超常的挖掘和配置，而社会迫切呼唤能够整合秩序的人。也就是说社会需要一些极具人格魅力和组织才干的人物把社会资源整合起来共创事业。一代伟人曾国藩经过后人近 130 余年的细细品味，慢慢咀嚼，众多学者和政治家们惊奇地发现他身上的精神力量和价值理念对当代急骤变化社会中人们的选择，不无借鉴价值。

20 世纪末的几年，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界悄然地掀起一股“曾国藩热”，除了出版界空前活跃之外，政界、工商界对曾国藩的兴趣似乎更浓，以致于“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一时成为特定阶层某些人的时尚。对于这一特定环境和条件下出现的历史文化现象，人们从不同角度做过比较系统的分析。认为大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世界范围的儒学复兴热潮，为“曾国藩热”的产生准备了良好的土壤；二是新形势下中华民族新道德重建的社会呼声，为“曾国藩热”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三是对魅力型人物崇拜的自然延伸和纵深发展，推动了“曾国藩热”的出现和形成；四是大变局时代各路精英的沉浮荣辱不定，促使人们追寻一种在困惑之中探求成大事希望之光的精神力量；五是研究者



和著述者结合时代特征，向出版业的成功切入等等。都促使“曾国藩热”由学术热潮转为社会热潮。

“曾国藩热”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于那个时代一位特殊人物富有时代特征的某种理念的共振。我们请几位学有所长的博士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角度解读一下您心中的曾国藩。

晚清时代，一个王朝，乃至一种文明，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中华民族正处于危亡之中。这种“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促使封建王朝衰落了，封建文明衰落了，但这样一个时代也是造就英雄的时代。人们为了不同的目的、理想、价值而战，大变局的时代给了人们施展才能的大好机会。当今的中国也处于大变局的转型时期，但这种转型不是衰败，而是面临一个正在崛起的时代。一个崛起的时代与一个衰落的时代的不同点是显而易见的，但相互之间也能找到一些非本质上的共同点就是都处于大变局之中。现在我们国家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阶段，各种挑战是强大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时代也给予今天的优秀人物一个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对于在那个时代以杰出的毅力、品格和才能把握住了机遇，整合了社会资源从而成为对晚清有巨大影响、对他所效忠的朝廷起到巨大作用的曾国藩，当代人们对他关注更多的是想探寻一种借鉴的力量，并以此把目光更准确地聚焦在应当从事的事业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关注曾国藩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从现在来看，因为生产力的突破和提升，社会转型的过程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如果有人想要置身这一过程之外，其结果无非使自己陷入困境。不主动或拒绝参与这场革命性的变动，历史将证明，你必将要为自己的错误选择付出更大的生存或发展代价。因此，正确的态度应当主动去迎接这一变局，选好自己的时代的





切入点，把自己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对接起来。这种应变之策一方面需要前瞻未来的进程，另一方面也要回顾昨天的历史，而曾国藩无疑是我们回眸中值得比较、研究、分析的特殊人物。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不同时期大的社会变化的原因，都是原有的社会规范已经限制社会发展的实际。在变动的时代往往都是旧组织溃散和新组织创新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往往需要一些极具人格魅力和组织才干的优秀人物把社会精英凝聚起来创立事业。这样的优秀人物在社会平稳时期是很少能脱颖而出的，绝大多数的优秀人才只有在原组织框架中才能发挥作用，脱离了原组织框架，他们就难有场合表演自己，难以在有限的生命时光里被社会承认。所以，在原组织框架下，有序的环境和理念使人们更多地循规蹈矩、随大流，创新意识淹没于世俗的生活中，人们无法单独地施展才干，个人的魅力难以显现。在社会变动时代，社会资源空前增多，社会实践空前纷杂，能够并敢于“试”的人们如果善于抓住社会为人们提供的各种成就事业的机会，人人奋斗，渴望成功就不再是纸上谈兵。曾国藩在晚清时代就是具有这种素质的人物，社会变局为他提供了舞台，他本人也一再试图努力并最终抓住了机会。

曾国藩在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这方面无疑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借鉴的范例。他所处的晚清时代，官场极端腐败，军队极端腐朽，完全依靠体制内已无法给奋斗者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更不用说对付严峻的内忧外患了。曾国藩原为体制内之人，他利用体制内的资源（清政府共任命了43名团练大臣，他只是其中之一）聚集了大量体制外的人才，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才能，在原有组织正在溃散的情况下，形成了新的组织框架和秩序，避免了彻底的无序化，保证了社会相对的稳定。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



中国的体制演变，保存了文明的成果。当然站在不同角度的人们对此认识并不完全相同，但我个人认为重要的是看历史的客观存在。我们只要看看这张名单就够了：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彭玉麟、沈葆楨、容闳、薛福成、赵烈文，乃至曾国藩自己的儿子曾纪泽。这些在晚清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几乎都在曾国藩身边工作过，受过他的提拔，至少得到过他的大力帮助和影响。正是由于有了曾国藩对于这些人才资源的整合，湖南才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偏僻省份一跃而成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挥着特殊作用的省份。曾国藩这种召集人才及使用人才的能力和付出的心血足令我们钦佩。在市场经济惊涛拍岸的中国，急需这种总揽全局之才。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内外交困的时代，是需要变革的时代。过去的历史学家，有点像法官，总要对历史人物进行裁决，但裁决的依据却往往不是事实，或者说不完全的事实，或者说更多的是以政治需要为转移，这样的“盖棺论定”不是失之偏颇，就是根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为此，在曾国藩身上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些东西，重新评价一下他的历史作用。

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曾说：“历史不仅是知识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而且还打开了通向其他许多部分的门径，并为许多科学领域提供了材料”。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的思想与言行，在社会上留下广泛的影响，无疑应当客观评价。

曾国藩一生中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是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二是“师夷长技”办洋务运动。而这两件事正是我们评价曾国藩的焦点。镇压太平军，这是他在历史上所起的负面作用，这一点当代中国的史学家们早有定论，今天反省历史，



也无须推倒定论，另加评议。但究其一生来看，他所起的正面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创立并倡导洋务运动和派遣留学生赴美，都体现了这个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不但不泥古而且很有远见卓识。

这几年，许多史学工作者对“曾国藩热”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一个历史人物能再次走进我们当代社会，说明人们能在曾国藩身上解读出我们现在社会的价值观的某些趋向，那就是怎样办成事或成大事，怎样组合、利用社会资源。

曾国藩忠于朝廷，“拼却声名以顾大局”，这说明他对朝廷是尽职的，对朝廷忠诚伴其一生，也是他成大事的一个基点。现在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曾国藩为传统的儒家道德规范所累，最终成为封建王朝的刽子手乃至殉葬品，没有利用他当时实际上掌握中国东南半壁军政大权的大好机会，推翻满清的腐朽统治，乃是一大失误，阻碍了历史的进步。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值得商榷。

曾国藩生活在中国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激烈、尖锐、复杂的国内外矛盾与斗争，把他推到时代暴风雨的风口浪尖上，造就了他复杂的思想与性格。但“成大事”与忠于朝廷是其立世的主导方面。

曾国藩看到了大清江山的不可挽救，但是他能挽狂澜于既倒，并使之中兴。这从他与赵烈文的一系列谈话并未对后者关于大清将亡的议论进行反驳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另外，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强调忠君，另一方面也并不排斥以有道伐无道，以有德之君替代气数已尽之衰朽王朝。曾国藩之所以不反大清，可能有许多原因，但我们决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曾国藩是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的儒家知识分子，他很可能会想到反清也可能出现一种极为悲惨的局面：天下四分五裂，不知有多少人称帝称王，在百姓亟需大乱之后休养生息之时，再一次生灵涂炭。关于这一



点，当然今天的我们不可过分自作聪明。当湘军攻下天京时，他的部下们逼曾国藩“黄袍加身”，他的朋友三次游说，授帝王之术，他却一概婉辞，并写了一幅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可能是很贴切地反映了这位儒臣的内心世界。

美国汉学家芮玛丽在《同治中兴》中有这么一段叙述：“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逃生，又延续了六十年，这就是同治中兴。”也许人们会问，让一个注定要灭亡的王朝多延续六十年究竟意义何在？这些杰出人物究竟杰出在哪里？但历史的发展并不那么简单。实际上，到了二百年之后历史学家们也还会争论，对于历史进步而言，究竟是有同治中兴好，还是没有同治中兴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希望进步层层加码、一步到位的历史观念有其正确的一面，也有其可以质疑的一面。对于曾国藩，对于其他类似的历史人物，都不应该过于简单地评价。人类的文明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跳越式或螺旋式发展有时是需要的，但社会发展更多的是一种理智不间断的延续，跳越多，发展到一定时期是需要补课的。我们今天发展市场经济，逐步废止计划经济，对这种观点恐怕反对的不会那么多了。

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实际上是说，当代人述写过去的历史必须为当代人提供新的对历史的认知，否则便是多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史的惟一道路是认识我们研究历史与历史人物，最终的目的是要归结到实践性，除此以外不会有太大的意义，要对曾国藩做出十分恰当的评价，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如何认识曾国藩这位复杂的、具有影响的、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关键作用的历史人物？现在有一些青年学者提出：“理解”。“理解”是否是我们给曾国藩以比较恰当的历史定位的前提？而不是不分





时代乱加指斥。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要算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褒贬不一，毁誉各异，令人无所适从。褒者如梁启超，说他“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是有史以来中国乃至世界“不二三睹之大人物”。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郭斌和在《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一文中则讲道：“曾国藩是我国旧有教育理论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德才俱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文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西洋历史上之人物中，造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数觐”。当然不乏过激之词，如“不残忍”就是偏袒。曾人称“曾刺头”，还不残忍？在他们看来，曾国藩就是“圣相”，是古今完人。而贬者却又把他贬入十八层地狱，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就认为曾国藩是：封建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来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者，又是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们的“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这里曾国藩又是一文不值、不足称述的人物。如此毁誉两极加于一身，不能不说是一大历史公案、一种令人难解的“曾国藩现象”。看来只有给予“理解”，才能回归历史的真实，当然“理解”并不是不要是非。

要“理解”，就要有所“体验”、有所“沟通”，就要“回归历史”。就是说，不要以当代人的眼光或标准去审视历史人物，而应当把曾国藩置于当时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去加以认识、给予



“理解”。

“理解”不是评判的标准，要给曾国藩以恰当的历史定位，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上做出评价。过去，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政治斗争”，那是荒唐年代的荒唐标准，不足为训。包括范文澜的评价，也是政治枷锁下的产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领域的复苏与活跃，理论界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视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准，思想逐步解放和关于真理的讨论，评价历史人物进步与否，要看其是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没有错。但相对于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活动来讲，纯粹物质性的、经济性的生产力“一维标准”未免显得简单化。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判断一个历史过程或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是否进步，要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民主进步的程度和人的自身的全面发展程度这“三维标准”的“综合量”。这个“三维标准”可否说就是我们理解、评价曾国藩的标尺。

自然，评价曾国藩首先遇到的，也是不可逾越的问题就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因此有人就提出，要全盘否定太平天国革命，为曾国藩翻案。理由是洪秀全把西方基督教移植到中国，如果成功了，将会把中国拉回到中世纪最黑暗的神学时代；曾国藩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了，使中国避免了一次历史大倒退，因而应该全盘肯定曾国藩。这种观点，过于偏激，也过于假设，不符合历史事实。太平天国革命固然留下许多教训，但其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进步倾向不容抹杀。更可贵的是，太平天国领袖们提出了发展生产、改良政治的方案，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洪仁玕新政”。这是一项充满时代气息、体现社会进步趋势的纲领性文件，其核心内容就是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改革社会习俗。洪仁玕描绘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蓝图，洪秀全表





示支持，并明确指出，“钦定此策，杀绝妖魔，行未迟”。可以预料，如果太平天国革命取得成功，中国也很有可能步入近代化道路，用“三维”标准衡量，这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进步潮流。由此可以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是不能肯定的。曾国藩是“旧有教育理论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是“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因而有着浓厚的正统思想、忠君意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他投笔从戎，担起戡平“大乱”之任，这也是符合逻辑、顺理成章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能理解这一点，可能就不会责之过苛，将其一棍子打死。这样他给人的印象就既不是一个手握屠刀、嗜杀成性的“汉奸、刽子手”，也不是一个完美无瑕、高山仰止的“圣哲”，而是一个有一定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理想、忠于朝廷的“马上书生”，这样对他的评价可能更贴近真实。

曾国藩以一介儒生，居然把燃烧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的熊熊烈火扑灭了，这是有他成功的经验的，毛泽东就曾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国藩，……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设使易以他人，岂能若是？”陈毅说得更直截了当：“曾国藩用兵很有一套，在军事上很值得研究。”毫无疑问，曾国藩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据说，新时期军事史学界对于曾国藩军事上的才能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曾国藩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办洋务。传统观点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镇压农民革命，维护腐朽的清政府封建统治，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洋务运动是在农民革命的大风暴中产生的，有绞杀农民革命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是中国由闭关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近代的里程碑，从这点



上说，它是具有相当革命性的历史变革。对社会发展影响巨大的洋务运动把“师夷长技以制夷”从纸上、口头上变成行动，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结构及社会面貌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历史前进了一步。而曾国藩，则是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是“洋务运动之父”。经他之手，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办起中国第一家大型的多功能的近代工业基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了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仅此数端，曾国藩可谓成就辉煌。反过来说，建国几十年，贯穿始终的是闭关锁国、洋奴哲学、崇洋媚外、爬行主义，从而一穷二白，曾国藩自然是罪人无异了。

曾国藩办洋务主要从物质层面入手，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至于政治方面，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当时中国近代工业发展还很有限，近代资产阶级还没形成，政治变革的时机没有成熟，当然不可能要求出自旧营垒的曾国藩革新政治。但随着中国洋务运动及近代工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物质力量带来的精神动力不可忽视，政治变革势在必行，从这方面说，曾国藩是有奠基之功的。

当时，外交是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曾国藩在外交上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被骂为“卖国贼”，弄到举国欲杀的地步。其实，“和”、“战”都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这要看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综合国力。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耻、以战为荣的观念，影响深远，成为臧否人物的标准，这也是曾国藩所深知的。他在致李鸿章信中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一意主和”。曾国藩所以“力保和局”，是限于当时中国国力情





况，这是可以理解的。“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在当时，恐怕也只有曾国藩敢如此作为，这也正是他与别人不同之处。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人们自然可以从不同的侧面、选择不同的角度进行透析，各抒己见。可以从曾国藩身上的优长劣短、正面与负面透见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与消极、精粹与糟粕的两重性。作为官吏，曾国藩是地道的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封建官员。单纯从政治上的道德给曾国藩定位似乎并不恰当，现在，应在文化上给曾国藩加以定位，才更恰如其分。

这几年，有的学者对曾国藩研究探寻转向于文化上。努力寻找曾国藩的个性，其个性十分复杂：既魄力宏大，又胆气薄弱；既冷酷残忍，又温情脉脉；既老谋深算，又轻信人言；既敢于斗争，又忧谗畏讥；既自强自立，又相信命运；既严肃端谨，又诙谐风趣，等等。个性是他的外在表现，其源在他的内心世界。曾国藩的内心世界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资质，一是修养。做官之前，曾国藩曾师从过欧阳凝祉、汪觉庵、欧阳坦斋，这些人都是湖南著名学者。考中秀才后又进了岳麓书院。进翰苑后，又拜一代名师唐鉴攻理学。湖南学风远承周敦颐之余绪，近受王船山之影响，到清末已形成一个带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学派，当时号为湘学。湘学重性量，讲节操，立足在经世致用。士人平日切磋学问，砥砺品行，一旦风云际会，则出而担当天下大任。曾国藩可谓其典型代表。

毛泽东年轻时曾对友人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无疑是具有人格魅力的。《曾文正公家书》可能有自我拔高之嫌。但就其一世功业来看，他的道德品格也的确有令人景仰之处。曾国藩是个恪守儒家道德规范的理学名臣，但他既要经世致用，就不能不用机谋权变，这绝非为他辩解。他后来是磨炼得非常善于机谋权变的。这也许就是现在有人大讲的“做官要学曾国藩，经



商要学胡雪岩”的一个原因。然而，曾国藩术的一面始终是围绕着他的道的一面转的。道是核心、是主轴，这一点毫不含糊。曾国藩是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十分重视讲求经世致用，从传统价值观看，他确实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在他的带动下，当时相当一批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在文治武功两方面都颇有建树。我认为，曾国藩身上凝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美德今天是不过时的。

讲到曾国藩所具有的人格魅力人们就会想到，怎样评价太平天国的将士们。评说曾国藩文治武功，并不是降低太平天国运动这一英雄主义壮举，正如有的学者讲：那些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当然有以造反争取他们的生存、追求他们的理想生活的权利，他们的事业当然可歌可泣。

历史已经进入到 21 世纪。科学的思想与学说已逐渐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评说曾国藩，并不是想让人们的思想回到“周公孔孟”之世，去东施效颦。我们主要是崇尚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美好的一部分。那就是人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去努力奋斗，并把这种理想同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也许这就是今天人们推崇曾国藩的一个真正原因所在。学习他，剔除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还只需要倡导并使之发扬光大的。

曾国藩研究，其势不衰。关于曾国藩的书籍，更是铺天盖地而来，出版热一浪高过一浪。曾国藩犹如一张加味的饼，翻过来是甜味，翻过去是咸味，再翻过来又增了辣味，但万变不离其宗，仍然是那么几种滋味。我们编辑的这套书，则一改旧模式，从他的智源入手，找出原动力，继而就曾国藩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天津教案、李秀成之死、察人用人、家书家训、读书治学、百年家世以及与皇帝大臣、与幕僚下属、与儿子亲人等多方

